

抓住研究靈感經驗談

曹仕邦

——以自己最初三篇史學論文
如何發現題目與研究過程中如何破解難題為例(下)之一

第三篇：〈中國佛教史傳與目錄源出律學沙門之探討〉，此文發表於香港《新亞學報》，分三期刊出，上篇刊於六卷二期，一九六四；中篇刊於七卷一期，一九六五；下篇刊於七卷二期，一九六六。這是筆者在完成(中)所述的「三年級研究生」底研究工作之後，受聘於新亞研究所作永不升職加薪的「助理研究員」職務¹之後提出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全文共有十六萬多字。

這篇論文如何發現題目，是很偶然的。事緣舍弟剛升讀國中一年級，筆者帶他到電影院看一齣日本人製作英語配音的卡通片「西遊記」。散場後，舍弟問唐三藏當年是否有三個徒弟護送他往西天取經？筆者隨口回答：「唐三藏是自己一個人往印度求法，並無徒弟隨行。不過他後來回國從事翻譯佛經之時，譯場中的助手如道宣、辯機等，從關係上說也能算他的徒弟了。」

言畢，一個念頭閃電似的在腦海中湧現：「道宣是律宗的九祖，也是《續高僧傳》和《大唐內典錄》的作者！」

筆者何以有此湧現？一來因醞釀第二篇論文而知道古時譯經是主譯人一邊譯一邊講解，而助手們相當於聽受義理的弟子；二來，不久前讀過陳垣先生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以下簡稱「概論」)《》，內中稱道宣是律宗的祖師，更介紹了宣公的著作。

此念既興，坐上公車返家途中，從陳氏書中得來的知識不斷在腦海中湧現，想起《出三藏記集》的編輯人梁釋僧祐、《開元釋教錄》的編者唐釋智昇、《宋高僧傳》的撰人北宋釋贊寧都是研治戒律的沙門，不禁思及此類僧徒何以從事史學與目錄學的撰述？

於是歸家之後，改日跑到鄰近的中華佛教圖書館去翻尋有關典籍，從而找出更多的律學沙門從事於此。他

們是：《名僧傳》與《比丘尼傳》的撰人梁釋寶唱、《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撰人唐義淨三藏、《大周刊定衆經目錄》的主編武周釋明佺、《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的主編唐釋圓照，都屬此類。不禁想到從梁代的釋僧祐到北宋初的釋贊寧，前後相距六百多年，而上述諸書是佛教史學與目錄學最重要的著作，而它們都出自律僧之手，這的確是個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題目。因此準備寫研究計劃，向研究所當局呈報了。

然而馬上碰到了難題，因為所有史料都未言《高僧傳》的撰人梁釋慧皎是一位律學沙門，倘使他所治佛學跟上述諸人有別，則「史傳」方面有了例外，使得本論題不能成立啊！

後來偶然想起一則天文學的故事：西方天文學家們注意到火星、木星之間的距離遠闊得不成比例，不符幾何級數。經努力搜求之下，找出火、木兩星之間有「小行星帶」一個碎裂大行星的無數碎片散在原本的軌道上運行。火、木兩星之間夾有這小行星帶，則距離的比例合符幾何級數云云。

從上述的故事，筆者悟出本題目可能有一似小行星帶般隱晦不彰的地方，因此檢史書重讀，終而在《續高僧傳》卷七《慧皎傳》中找到皎公的著述除了現存的《

高僧傳》之外，更有已佚的《涅槃（經）義疏》和《梵網（經）疏》。《涅槃義疏》肯定跟律學無關了，但《梵網疏》呢？筆者檢明釋智旭的《閱藏知津》，知道《梵網經》是大乘佛教的戒本，慧皎能替它作註釋，當然也屬一位律學沙門²，於是奇經八脈一時打通，慧皎跟僧祐、道宣、贊寧等連得上線了。雖然，其他撰僧傳、編經錄的律學沙門所研治的是小乘佛教的律典如《十誦律》、《四分律》、《僧祇律》等³，慧皎注釋大乘戒⁴，跟他們稍有別而已。

要研究律學沙門修僧史、編經錄，則先要了解律學跟史學。有無關連？筆者因此檢尋《大藏經》中〈律部〉所收諸聖典，發現律典都記載佛教最早兩次的聖典編集——「五百比丘結集三藏」和「七百比丘結集三藏」的原因和經過，知道律學僧徒是注意歷史發展的，於是中國律僧們從事於此，得到初步的解答了。

再者，筆者記起中國史學有所謂「褒貶」的思想，過去的史學家們深信孔子在修《春秋》這部魯國的編年史之時，筆下對歷史人物有所「褒揚」或加以「貶斥」⁶。另外，從佛家或俗世的史籍，知道古時僧團之中一直混有不少害群之馬，這些非真正服膺佛旨之人的不守戒律與胡作非為，律學沙門是非常痛心的。然而限於

種種因素，他們難以對此加以整治。是以律僧之中有史學修養的人，便本著「褒貶」的精神，著書表揚戒行高潔又對佛教在華發展有貢獻的沙門，作為後輩出家眾的榜樣，希望通過教育的手段來振興釋門的頹風。由是建立了華夏僧伽有修史的傳統⁷。

更有進者，中國目錄學有「辨偽」的思想，目錄學家們刻意追尋一部古書真個屬古時人執筆還是後人託名古德而著書。而據僧家或俗家史料，知道古時一直既有從印度傳入並譯成漢文的真正佛經，又另有中土之人所撰；混有中國本土思想的假佛經。這些淆亂佛家正統思想的偽經歷代皆有，而且為數眾多，這也是律學沙門痛心的問題。因此他們本著「辨偽」的精神而編寫佛經的經錄，一方面詳述一部佛經何時自域外傳來並何時翻譯的經過，另一方面又從經文的內容審查是否滲有中國思想的膺品，俾究心聖典的人據此而知所選讀。於是也建立了僧伽有編纂經錄的傳統^{7A}。

律學沙門從事上述兩項工作的原因總算弄明白了，馬上又發現新的問題。因為倘使僅論述上面所陳，頂多能寫一篇萬多兩萬字的短篇論文。這固然很不够瞧，並且呈報上去，而研究所又持此向資助者的美國基金會「哈佛燕京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要研究費

之時⁸，人家是否通過審查呢？

此時節，筆者想到陳垣先生的《概論》雖然是不錯的啓蒙性典籍，但它論及一部史書之時，往往未將書的結構講個清楚⁹，又經常為了炫耀自己的博學而下筆，未真正顧及初學的讀者們底需要¹⁰。如今何不將餅造大，把上面開列的「史傳」與「目錄」逐一加以深入探討，詳細分析這些書的結構、內容和作者所受到的影響為何？俾讀者更了解此類著作的貢獻而知如何對它們加以利用？因此擴大研究範圍，寫成研究計畫，果然哈佛燕京社予以通過了。

這篇大論文的主旨是研究律學沙門的修史傳與編目錄，故討論的先後依作者的年代為次。如今為了方便說明，先述史傳部分遇到的難題，再談目錄的部分。

首先，是《名僧傳》有一重要貢獻，是其書目錄所載僧人傳記，僧名之上必誌時代與寺名，如「漢洛陽蘭臺寺竺迦攝摩騰」、「吳建初寺康僧會」等是，無寺名則誌以地名，如「晉豫章康僧淵」、「偽秦河西曇無讖」等是。後求的「高僧傳」一類著作都承襲此一作風。寶唱何以創作此法？蓋因為沙門往往同名之故。

然而沙門何以往往同名？如東晉時有著名的釋道安，而遲至近代，台灣地區也有已圓寂的道安法師。何以

故？筆者一時答不上來。然而若不加以解答，則將對不起讀者啊！

後來想起華人之宗奉天主教的，神父必另賜一洋文的「聖名」，何以有此制度？乃向天主教人士求教，知道賜聖名是爲了令教徒以該聖人的人格作一生的榜樣，頗存有勉勵教誨之意。因此思及佛教沙門的法號，亦存勉勵教誨的作用，如「法勇」可解釋爲得「法」須「勇」猛精進、「道宣」可解釋爲佛「道」應加以「宣」揚等是，於是解決了這小難題。

其次，《高僧傳》將書中立傳的高僧分作「十科」，其最後兩科是「經師」與「唱導」，稱爲「經師」的法師們將譯成中文的佛經配以音樂節拍，然後對衆清唱；稱爲「唱導」的僧侶們則將佛經內容簡化爲顯淺易懂的故事，然後對衆宣講，兩者都是對文化水平不高或完全文盲的普羅大眾宣法底方式。然而上述的那些話，筆者研究慧皎書之時，未能體會出來，只好含糊其詞。及至一年後研究《續高僧傳》，方弄清楚上述兩者的任務和作用，而道宣書將兩者合成《雜科聲德》，於是趁這機會在此予以補述。

第三，研究《宋高僧傳》部分之時，由於這史書是贊寧奉北宋太宗旨意而執筆，其書結構全依《續高僧傳》，是以起初筆者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以下筆討論。

註：

1. 新亞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們全體由哈佛燕京社資助，每人月薪一百美元。所方不管匯率升降，僅發給六百港元。由於學歷不被港英承認，筆者只好委屈於此職近十年（自嘲這時期是「被壓五指山」的日子）。直到後來有機會進香港中文大學就讀而在一九六八年取得港英頒授的碩士學位，始能出生天而往新加坡國的南洋大學執教。

2. 拙文上篇刊出後，即時有自命學問淵博的某前輩寫信來「踢館」，譏筆者「不必艱辛吃力」地將慧皎「牽合於律宗」。筆者回信說：「倘使慧皎的確非律宗人物，則後學牽合亦無從。反過來說，他是律宗人物而史文有晦，若不將真相揭出，則有違史學求真之道，是以不避艱辛吃力，也將真相考出。」駁得他啞口無言！

3. 中國屬佛教的大乘教區，而律僧們所以研治小乘佛教的律典，這緣於華夏寺院用小乘戒規來管治僧尼，其原因請參筆者未刊博士論文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Vinaya in China的首章，又參拙作〈中國律宗史概說〉，刊於《南洋佛教》第二五三期，新加坡，一九八八。

4. 《梵網經》如今已考知屬華人偽撰，而慧皎卻去研究它。其原因在本論文的上篇頁四七六—四七七有所交代，今從略。

5. 依中國傳統對典籍的「經、史、子、集」四分類法，目錄類歸入「史部」。

6. 雖然如今已考知這僅屬儒家誇大孔子重要性的講法，但古人對「褒貶」之說是深信不疑的。

7. 關於這點，請賜閱拙作《中國佛教史學史》。出版時請參本文（中）的註2。7 A. 同前註。

8. 參註1。記得那時新亞研究所向哈佛燕京社要錢是要得很可憐的。所方每年要將全部助理研究員的研究計劃譯成英文，趕在人家開會審查之前寄達美國，人家肯通過了，纔申請得一年的研究費，不然，所方無錢發薪給我們。

9. 例如《概論》言及《高僧傳》之時，僅列出書中將僧人分作十科，如「譯經」、「義解」、「興福」等的篇名寫出，不說明什麼叫「義解」或「興福」。關於慧皎書與道宣書的十科，其內容與先後排列的暗示，請參拙作《中國佛教史學史》頁九十一—九五，又頁一二四—一三〇。

10. 參拙作（論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全文，刊於《中華佛學學報》第三期，台北，一九九〇。

中央圖書館展出《趙城金藏》卷軸

由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國家圖書館合辦的「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展」，於十二月八日在香港正式開幕。中央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李剛、國家圖書館館長周和平和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等皆應邀出席當天的開幕禮。

此次在中央圖書館展出的珍藏共有四十二項，展品涵蓋敦煌遺珍、古代輿圖、金石拓片、善本古籍及中國少數民族文獻五個類別，包括有金代佛教藏經《趙城金藏》卷軸、明代的《十竹齋書畫譜》等，其中有十二件為珍貴原件。

至於敦煌遺珍有唐代的《老子義疏》《辯亡論》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複製品；輿圖即地圖，有明代政區地圖《輿地圖》和清代《避暑山莊全圖》等複製品；金石拓片則有清代《印心石屋圖說》原件、東漢《漢君車畫像》拓本複製品；《趙城金藏》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是其中一項善本古籍原件，反映了當時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盛況和雕版技術的高超、另外《十竹齋書畫譜》在中國木刻畫史上佔有極高的地位，此亦是善本原件；中國少數民族文獻則包括清代《玉麟父母誥命》等原件。

此次展出的展品中有十五件，國家圖書館宣布將贈予香港中央圖書館。